

建初寺的历史沿革及其消亡

◎ 曹福华

江左祖庭

后汉三国吴赤乌十年(247)^①,江左地区首座真正意义上的寺庙——建初寺落成,其址位于当时的小长干一带(今南京门西地区花露(盪)岗以南),因临近大市(规模较大的集市),故亦称“大市寺”。

应该说,建初寺的诞生,实乃“南朝四百八十寺”滥觞之标志。此前,佛教虽已在江左地区悄然呈萌芽之状,譬如,《后汉书》载,丹阳郡人笮融,曾在徐州牧陶谦手下谋得“委输”督粮之差,他以垄断三郡漕运之利而“大起浮图寺”;三国时期的丹阳郡,已从宛陵(今安徽宣城)移治于秣陵(今南京),其址大抵位于



元集庆路图

今淮水以南^②，故《梁书》、《南史》、《高僧传》等文献均称，东吴时期的秣陵（今南京）长干一带已“有尼居其地为小精舍”，但佛教作为一种舶来文化，此时由于缺乏佛学经义理论的宣讲与传播，显然还未能在此形成广泛的受众基础。

事实上，早在建初寺落成之前，西域僧人安世高已来过江南地区传播佛教。安世高，名清，史称僧安清，他本是西域安息国（西亚古国名，后称波斯，国土覆盖今伊朗高原及两河流域）王子，因心惟苦空，遂让位于叔而皈依佛门，立志弘扬佛法，故不远万里，前来华夏传播佛教。不过，早来的安世高却未能在此建起寺庙，倒是迟到58年的西域人康僧会，成功说服吴帝孙权，实现了造寺的愿望。许嵩《建康实录》云：

是岁，胡人康僧会入境，置经行所，朝夕念佛，有司以闻。帝曰：“昔汉明帝感梦金人，使往西方求之，得摩腾、竺法兰来中国立经行教，今无乃是其遗乎？”因引见僧会，其言佛教灭度已久，唯有舍利可以求请。遂于大内立坛，结静三七日得之。帝崇佛教，遂于坛所立建初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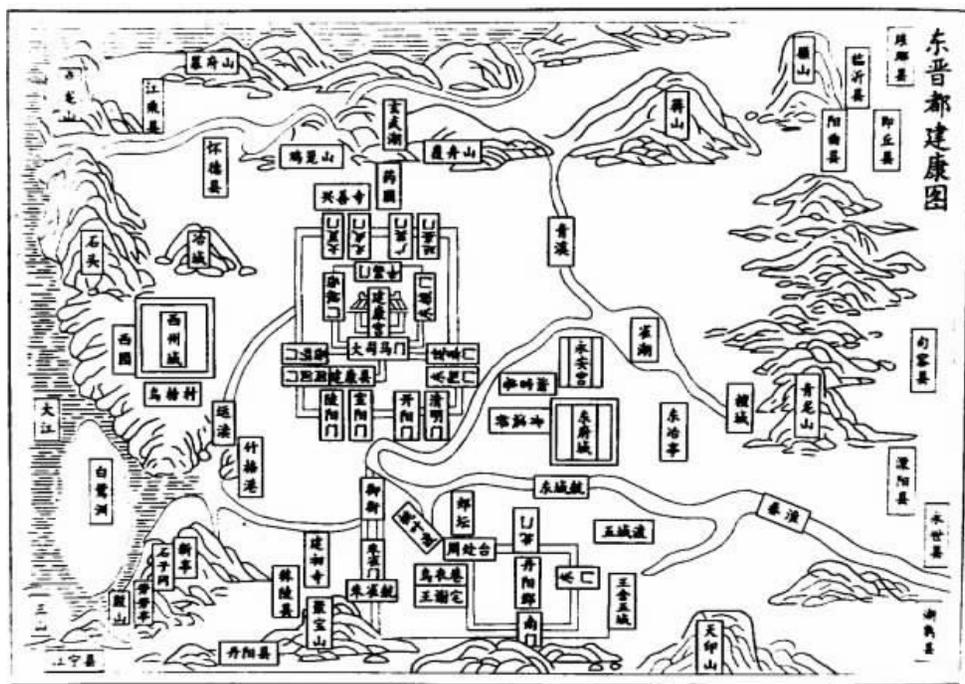
建初寺的创建者康僧会，原为康居（古西域城国名，约于今巴尔喀什湖与咸海之间）人氏，祖辈曾世居天竺，后随父行商移居交趾（古地区名，大约相当于现广东广西的大部分和越南的北部），十余岁时因父母双亡，遂出家为僧。三国时期，康僧会振锡江南，开创寺庙建设之先河，《高僧传·吴建业建初寺康僧会》较详细地记述了他的建寺经过：

时吴地初染大法（佛教），风化未全。僧会欲使道振江左，兴立图寺，乃杖锡东游。以吴赤乌十年初达建业，营立茅茨，设像行道。时吴国以初见沙门，睹形未及其道，疑为矫异。有司奏曰：“有胡人入境，自称沙门，容服非恒，事应检察。”权曰：“昔汉明帝梦神号称佛，彼之所事，岂非其遗风耶？”即召会诘问，有何灵验。会曰：“如来迁迹忽逾千载，遗骨舍利神曜无方。昔阿育王，起塔乃八万四千，夫塔寺之兴以表遗化也。”权以为夸诞，乃谓会曰：“若能得舍利，当为造塔，如其虚妄，国有常刑。”……乃共洁斋静室，以铜瓶加凡，烧香礼请。……三七日暮，犹无所见，莫不震惧。既入五更，忽闻瓶中锵然有声，会自往视，果获舍利。明旦，呈权，举朝集观，五色光炎照耀瓶上。权自手执瓶，泻于铜盘，舍利所冲盘即破碎。权大惊，肃然惊起而曰：“希有之瑞也！”……即为建塔，以始有佛寺故号建初寺。因名其地为佛陀里。由是江左大法遂兴。

虽说《高僧传》的记载颇有些“匪夷所思”，但关键点毋庸置疑：建初寺的出现，在南京佛教文化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，其最直接效应便是“江左大法遂兴”，孙吴建寺之风由此盛行。譬如《三国志·吴书》载，吴太平三年（258）孙綝独揽大权后，“意弥溢，侮慢民神，……又坏浮屠祠，斩道人”，是时距赤乌十年（247）仅过去十一年，江左地区想必已是寺院林立，否则“又坏浮屠祠，斩道人”之说便难以成立。相传，康僧会在建业完成建初寺后，又曾一路东行弘法，于江南各地建寺造塔，例如，名闻遐迩的苏州报恩寺（后称瑞光寺）、塔，无锡圆通寺等古刹，均称建于吴赤乌年间。鉴于此，明人葛寅亮称建初寺“实江南塔寺之始”^③；晚清学者陈作霖也认为“江东之有佛寺自此始也”^④。这足以说明，将建初寺称作“江左祖庭”洵为实至名归。

历史沿革

建初寺虽堪称“江左祖庭”，但不幸的是，按有关



东晋都建康图

知建康府兼江东安抚使、行宫留守，因“岁久屋弊”，乃重修凤凰台与保安寺，“建殿宇及方丈、观音殿、水陆堂、厨堂、库院，移钟楼冠青龙首，增建廊屋，横直一十八间。”^⑦这或许是保安寺在大宋时期的最后之余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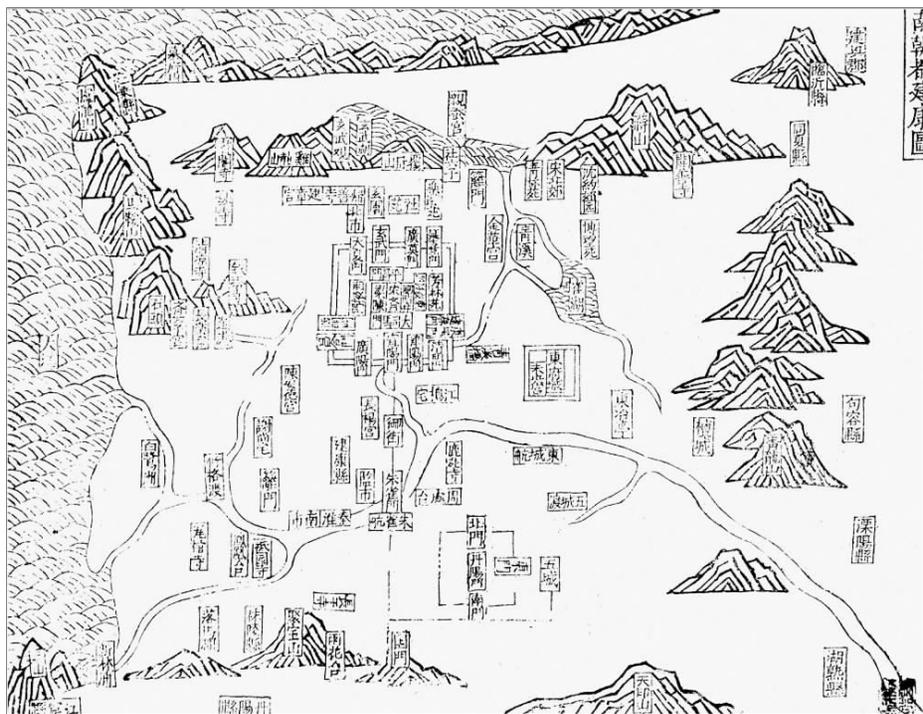
保安寺的彻底消亡大约是在元末明初，至少，当元人张铉修《至正金陵新志》时，该寺还存在。其卷十一《祠祀志·寺院》曰：“保安禅寺，在城内饮虹桥南保安坊内。”不过，换言之，从建初寺到保安寺的一千多年历程中，其建筑架构与规模，实则早已在不断的复建过程中被改变，对此，《至正金陵新志》交代得比较详细：

晋宋有凤集此山，因建凤凰台于寺侧。宋更寺名曰祇园。昇明二年，齐太祖为比丘法愿造寺于其地，得外国砖，为白塔，又名白塔寺。唐开元中，寺僧大慧禅师者，明皇召至长安。寻求归山，诏可之，因改其寺为长庆寺，其额韩择木书。南唐保大中，齐王景达为先祖造寺，因名奉先。宋太平兴国中，赐额曰保安。祥符六年，增建经钟楼、观音殿、罗汉堂……

由此看来，在南朝萧齐时期，建初寺改名白塔寺就已经重建，而后的屡次更名，其实都有再建的痕迹，迨至保安寺，其构造与原先相比恐怕早已“面目全非”。更何况，花露岗侧尚有另一座古刹——瓦官寺的存在，在如此狭小的空间中，屡毁屡建的寺庙占

地范围难免相互交叉、重叠，譬如，《景定建康志》称：宋大中祥符年间重修保安寺时建“练光”、“凤凰”、“临虚”三亭。而北宋著名政治家苏颂（1020~1101），曾于仁宗庆历三年（1043）赴任江宁县令，此间，他与友人同游保安寺，写下《游保安院练光亭同丘程凌林四君分题用业字韵》一诗，开门见山便称：“寺本梁瓦官，地临吴建业。”这足以证明，曾经互为毗邻的古刹屡经修复后，它们原先的空间已被城市人居蚕食挤占，结果在重建过程中便免不了“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”。对此，晚清陈作霖的《凤麓小志》，不但详细考证了建初寺的演化过程，还交代了保安寺的最终归属：

刘宋元嘉中，建凤凰台于寺侧，改曰祇园寺。有僧求那跋摩驻锡于是。……齐太祖为比丘法愿新是寺，得外国砖为白塔，名白塔寺。唐初复名建初。开元中，改曰长庆，韩择木书额。南唐保大中，齐王景达为先主重造，因名奉先。宋太平兴国时，赐额保安，以饮虹桥南保安坊名也。祥符六年，建练光、凤凰、凌虚三亭。苏魏公颂诗有曰：“临吴建业何人结，虚亭胜概压危堞。”即其题练光亭句也（注：原文此处断句有误^⑧）。寺后又有览辉亭石刻，熙宁三年碑记，漫漶不可识。亭榜乃朱希真之隶书也。政和七年，改释为道，号神霄宫。南宋时复旧。建炎三年，高宗幸江宁，权以寺为行宫，旋移辟府治，御座犹留寺中也。寺旁小室曰



南朝都建康图

南轩，张浚开督府时，其子栻读书于此。逮元末，寺废，琳宫绀宇，遂并入瓦官寺中矣。

陈作霖先生称保宁寺废于元末，这一断言似可在《洪武京城图志》中得到印证。该《图志》为明太祖洪武二十八年(1396)敕礼部所修，其“寺观”目下所列聚宝门附近尚存的古刹凡五处：善世寺、天禧寺(古长干寺，后改大报恩寺)、碧峰寺、能仁寺、西天寺。待葛寅亮撰《金陵梵刹志》，不仅建初寺事迹被并入长干寺，而且保宁寺也归入“废刹”，再无只言片语谈及。

孙氏另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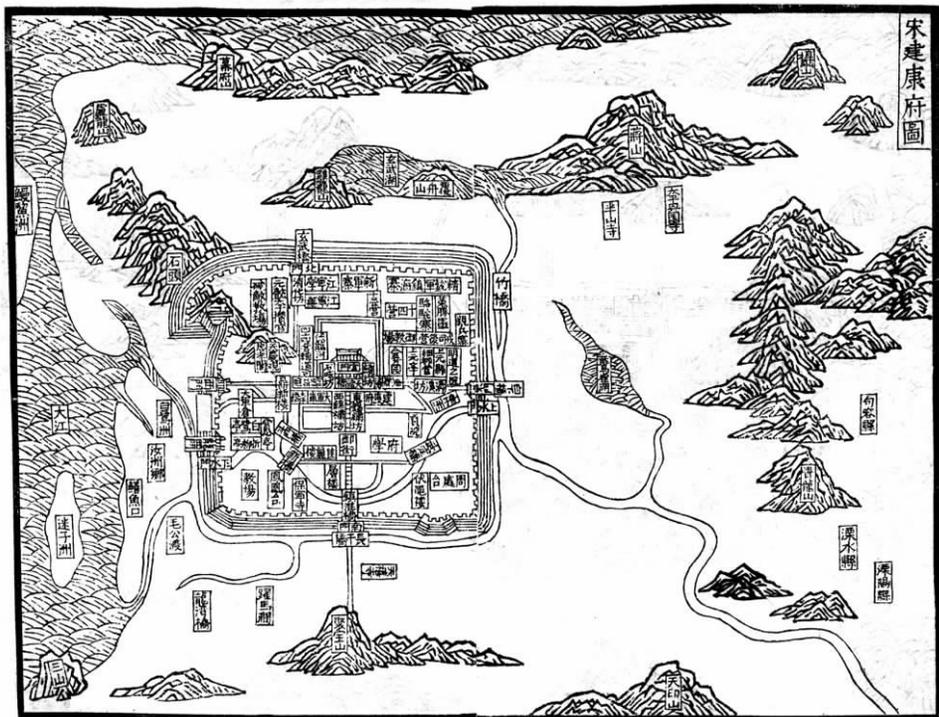
长期以来，关于建初寺的沿革，人们大多因循《景定建康志》、《至正金陵新志》的既定说法，似乎已成权威定论。不过，有人对此却不以为然，如清末学人孙文川所撰《南朝佛寺志》(陈作霖修订)，便认定建初寺在南朝并未改作祇园寺，而宋代则改名为法性寺，且于建炎年间(1127~1130)遭焚后一分为三。其云：

建初寺在古宫城南七里。……晋咸和中，苏峻

乱，塔焚，司空何充复为修造，平西将军赵诱又于寺东立小塔。宋元嘉中，有凤翔集此山，因建凤凰台于寺侧。南朝高僧如支昙霁、帛尸黎密、道儒、僧祐，皆居此寺。又有琮法师护持像法，汲引人伦，既卒，陈江总为之作碑。逮唐贞观中，懒融和尚亦卒于是。(案：《高僧传》历载晋、宋、齐、梁诸僧止建初寺者，是此寺在六朝从未改名。而《景定建康志》、《至正金陵新志》皆谓晋、宋改名为祇园，大误。祇园别自为寺，与建初无涉也。又《金陵新志》注谓晋改建宁、尤与晋、宋改名祇园之言自相矛盾。据《建康实录》云：“怀德县城在今建初寺东”，可见此寺历隋至唐犹存其名，并未尝改也。)后不知何时改尼寺。宋改名法性，建炎火，寺废，“法性”旧额仅存。及寺复建，析为三：在东曰石佛院，在西曰前法性寺、后法兴寺。元末犹在，至明遂无传。(案：建初寺再改法性，变为尼寺，即无建炎之火，已非赤乌旧制。况又析为三，则已沦为小刹。宜其入明之后，遂泯灭无存也。)

孙文川的说法显然与《景定志》、《至正志》大相径庭，但孙说也在《高僧传》、《续高僧传》等佛教典籍中得到一些佐证，如：

支昙霁，本月支人，寓居建业。少出家，清苦蔬



宋建康府图

食，憩吴虎丘山。晋孝武初，敕请出都止建初寺……
——《高僧传·晋京师建初寺支昙霁》

释僧祐，本姓俞氏，其先彭城下邳人，父世居于建业。祐年数岁，入建初寺礼拜，因踊跃乐道，不肯还家。父母怜其志且许入道，师事僧范道人。
——《高僧传·梁京师建初寺释僧祐》

释明彻，姓夏，吴郡钱唐人也。……，住上虞王园寺，学无师友，从心自断。每见胜事，未曾不留心谛视。……齐永明十年。竟陵王请沙门僧祐三吴讲律，中涂相遇，虽则年齿悬殊，情同莫逆。彻因从祐受学十诵，随出杨都，住建初寺。……
——唐·释道宣《续高僧传·梁杨都建初寺释明彻传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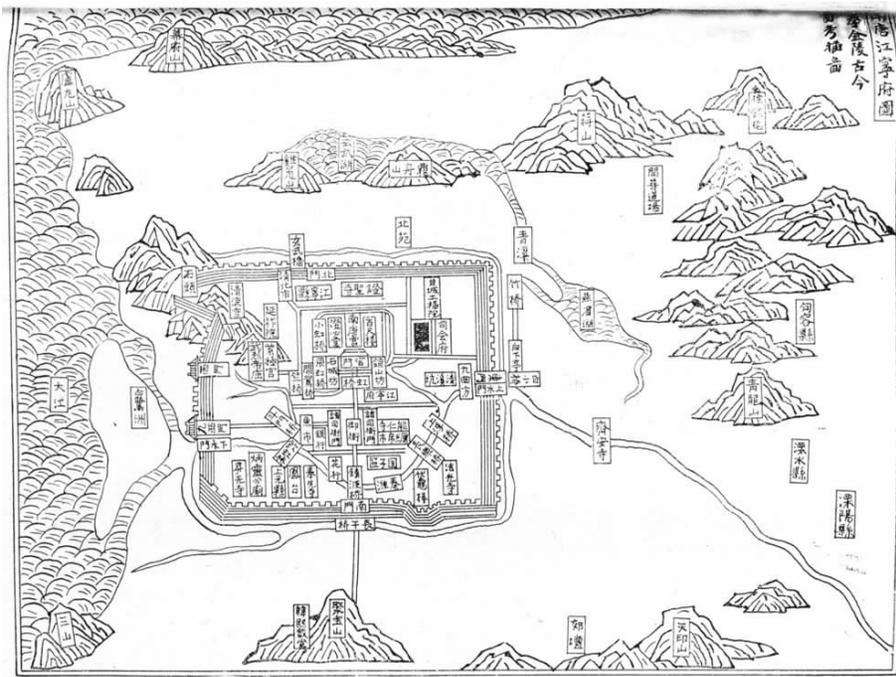
释智矩，姓吴氏，吴郡人。性矜庄，善机会，美容貌，雅为众表。又善草隶，偏爱文章，每值名宾辄属兴缀采，铺词横锦，勇思霏霜；而仪轨宪司，未沿流俗。初听兴皇朗公讲，讨穷深致，……末于故都建初寺又讲三论，常听百人。……
——唐·释道宣《续高僧传·隋西京日严道场释智矩传》

上述传主分别为东晋、南朝及隋朝时期人物，都曾与建初寺结下过不解之缘。而《高僧传》作于梁天监十八年(519)，作者为梁代高僧慧皎(497~554)。自东晋至萧梁，不过两百年的历史，因此慧皎在如此重要的典籍中，不可能将已经改名的建初寺仍呼旧名。《续高僧传》虽成书于唐代初期，但作者道宣(596~667)所纪，也仅限于自梁(502~557)迄唐贞观十九年(645)这一百四十余年的人与事，故与宋、元方志相比，当更接近所叙述的历史之原点。《南朝佛寺志》称建初寺最初毁于晋咸和三年(328)的“苏峻之乱”，据《高僧传》：

……至晋成咸和中，苏峻作乱，焚会(康僧会)所建塔，司空何充复更修造。平西将军赵诱，世不奉法，傲慢三宝，入此寺谓诸道人曰：久闻此塔屡放光明，虚诞不经，所未能信。若必自睹，所不论耳。言竟，塔即出五色光，照耀堂刹，诱肃然毛竖，由此信敬。于东更立小塔，远由大圣神感，近亦康会之力。故因写厥像，传之于今。
——《高僧传·魏吴建业建初寺康僧会》

确实，苏峻之乱致使诸多江左名刹毁于兵燹，建初寺也在其列，这是不争事实；但它劫后重生，仍称





南唐江宁府图

建初,这也有案可稽。即便到了隋朝,建初寺之名仍载于佛教典籍之中,如南朝文人江总(519~594)曾经历梁、陈二朝而入隋,他为宝琼大师撰写的碑文,便明白无误地名为《建初寺琼法师碑》。此外,南宋张敦颐所撰《六朝事迹编类》,向被学界认为叙事丰富翔实,然而,其论及建初寺时,也只字未涉该寺在南朝时期改名之事。

由上述史料不难看出,自东吴至隋朝,建初寺历六代之更替,虽多有劫难,但录于典籍的寺名却始终如一,因此,所谓南朝时期建初寺改名祇洹寺、白塔寺的说法,委实与文献记载相悖。对此,孙文川《南朝佛寺志》认为,建于东晋时期、位于凤凰台之西的祇洹寺,才是建初寺的分刹、白塔寺、保安寺的真正源头:

祇洹寺在凤凰楼之西(当今新桥之西),建初寺之分刹也。晋支遁尝升寺中高座讲义,与刘惔、王濛相酬答,其名始著。宋武帝永初元年,车骑将军范泰于其宅西建立精舍,因与寺近,遂袭其名。沿高僧慧义为之经始,并而合之。时人以义方身子泰比须达焉。……逮求那跋摩圆寂后,即于南林戒坛前,依外国闍毘之,就其处起立白塔,改名白塔寺。(案:天禧

寺前亦有白塔寺,与此不同。)其地与石子冈相望,故陈鲁广达屯兵于寺侧,以御隋师。及唐开元中,更额曰长庆。南唐保大中曰奉先。宋太平兴国中曰保安。至明而废为驍骑仓也。

看来,无论是《景德建康志》还是《至正金陵新志》,或许都搞混了建初寺的主干与分支的关系,以致顾此失彼,多有瑕疵;而孙文川的观点,倒是在《世说新语》、《宋书》、《高僧传》等历史文献中,均可找到明确的依据,如:

王濛恆寻遁(案:支遁,即高僧支道林),遇祇洹寺中讲,正在高坐上。每举尘尾,常领数百言,而情理具畅。预坐百余人,皆结舌注耳。濛云听讲僧众:“向高坐者,是钵舒后王、何人也。”
——刘义庆《世说新语·赏誉》引《高逸沙门传》

……泰博览篇籍,好为文章,爱奖后生,孜孜不倦。撰《古今善言》二十四篇及文集,传于世。暮年事佛甚精,于宅西立祇洹精舍。……
——梁·沈约《宋书·范泰传》

求那跋摩……以元嘉八年正月达于建邺,文帝引见劳问殷勤。……乃敕住祇洹寺……,
——《高僧传·宋京师祇洹寺求那跋摩》

对此我们不难得出结论:东晋、刘宋时期,位于凤台西麓的祇洹寺亦为一时名刹,多得高僧驻锡讲经,声闻丛林。至于孙氏称祇洹寺为建初寺分刹,此固为一家之言,但如果所谓建初寺曾改名白塔寺,那么,祇洹寺确在宋元嘉九年因求那跋摩圆寂而造白塔,故入齐之后,便再也无闻祇洹寺之名,取而代之的则是白塔寺。这足以说明:其一,建初与祇洹各有其所。建初寺之名历东吴、东晋、南朝、隋朝,屡屡出现在佛教典籍中,从未改名,而祇洹寺仅在东晋末年

与刘宋时期出现过,入齐后便销声匿迹,被白塔寺所取代;其二,建初寺与祇洹寺近在咫尺,抑或两寺确实存在着不同寻常的联系,而后人不明就里,自难免混淆不清。

此外,《景定建康志》所谓“祇园”看似与“祇洹”有别,实则两词同义。例如,北周庾信《王张寺经藏碑》云:“舍卫之国,祇洹之园。”祇园乃梵文“祇树给孤独园”意译的简称,相传释迦牟尼成道后,憍萨罗国的给孤独长者,曾用重金购舍卫城南祇陀太子园地而构筑精舍,请释迦说法,后用以代称佛寺。同时,倘据《唐韵》等韵书,“洹”的古读从水亘声,羽元切。如此一来,祇洹(yuan)的古代读音便与祇园完全一致,笔者以为,这大抵就是该寺在不同的文献中,称谓出现差异的原因。

余绪辨析

关于唐宋时期建初寺的演化,《景定建康志》、《至正金陵新志》及《南朝佛寺志》均称改换了门庭,但《景定志》只谈易名保安寺,《南朝佛寺志》则认为分割为前后法性寺、石佛院;而《至正志》则既谈保安寺,也谈法性寺(称为“法性尼寺”)。其卷十一曰:

法性尼寺,在报恩光孝观东南,本吴建初寺也。《实录》云:……建初寺,在县南二百步。……晋改为建宁寺,至唐以来为尼寺,今改法性寺。建炎火,旧额仅存。《庆元志》云寺析为三,近岁寺南酒务中陶灶下掘出大石佛像,归寺东院,遂呼石佛院云。今前法性、后法性二寺隶正西隅,大石佛在前寺正殿内。按《实录》建初本在吴宫中,唐县南二百步,前志以为即此寺。以古迹宣阳门及县城互考之,亦未有以证其必然。若以保安寺为古建初,则本寺所记耳。

于是,在今天的花盪岗下,唐宋时期又曾存在过一座名曰“法性”的尼寺。但《至正金陵新志》既称建初寺为保安寺的前身,旋又言法性尼寺从建初寺演变而来,从而给人的感觉是,仿佛因《庆元建康志》曾这么说过,所以才抄录存照,结果自相矛盾,难圆其说。对此,我们倘从源头上分析,恐不外以下诸原因:

一、地理因素。通过明人陈沂编撰的《金陵古今图考》不难看出,东吴及南朝时期,今花盪岗东南大小长干地区,实与聚宝山(今雨花台)相连,形成一片较为开阔的空间。在这块土地上,曾相继诞生了建初

寺、长干寺、瓦官寺、高座寺、祇园寺等古刹。时至五代杨吴、南唐之际,开挖的城濠(外秦淮河)已使长干为断,兼之修筑的城池也更进一步改变了原来的地貌肌理。当其时,易名为奉先寺的建初寺与瓦官寺一样,生存与发展空间顿为之狭窄。随着后来的战乱兵燹,寺院倾圮,且在劫后重建过程中,曾经的寺院在倾圮后渐被蚕食,重建时只能在附近择地而为之,遂使规模缩小,名不符实。

二、历史因素。中国古代方志原本缺乏精确的方位表述,缺少清晰的坐标感,因此,后人在揣摩过程中常互相矛盾。尤其是,大量原始实录文献的散佚(或者说根本就没有),以致历代撰志者难免根据现有的文献人云亦云,以讹传讹。就以建初寺为例,该寺历经千年之久,过程中屡毁屡建,故无论规模、建制、甚至基址,实则都已发生很大变化,或可谓此建初寺早已非彼建初寺矣。何况,在废墟附近先后建起的寺院,都可称自己是原先古刹的延续,而撰志者往往言其一点,不及其余,如同盲人摸象一样,遂彼此抵牾,让人莫衷一是。

综上所述,我们不妨这样推论:屡毁屡建的建初寺至宋代成了保安寺,那么,其当年的分刹祇洹寺,则有可能历经变迁后成了法性寺;而寺僧皆以古刹建初寺之余脉自谓,世人不明就里,照单全收,遂说法各异。其实,至宋元时期,无论是保安寺或前、后法性寺、石佛院,皆地处原建初寺旧址附近,大抵都能说与之有关,况寺院所传,原本一脉相承,只要不改弦更张,皆可称之精神延续。因此,关于保安寺、法性尼寺等究竟谁是建初之后,今人在追溯其渊源时大可不必厚此薄彼,自陷迷途。

【注释】

①有史志称建初寺建于赤乌四年(241),如《景定建康志》、陈沂《金陵世纪》等,此实谬,考《建康实录》当为赤乌十年(247)。

②见《金陵古今图考·汉丹阳郡图考》。

③葛寅亮《金陵梵刹志·聚宝山报恩寺》。

④陈作霖《凤麓小志·考古刹》。

⑤⑥⑦《景定建康志·寺院·保安禅寺》。

⑧陈作霖《凤麓小志》所引苏颂诗句本为五言,诗云:“寺本梁瓦官,地临吴建业。何人构虚亭,胜概压危堞。”但不知为何,竟被莫名其妙地截为七言句“临吴建业何人结,虚亭胜概压危堞”。